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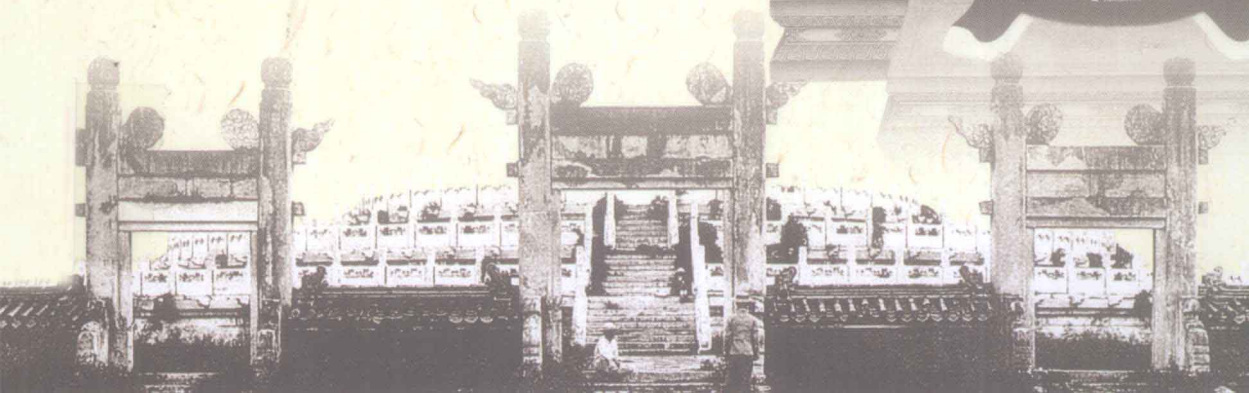
故宫文丛

帝国之雩

——18世纪中国的干旱与祈雨

紫禁城出版社

吴十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之雩——18世纪中国的干旱与祈雨/吴十洲著.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134-0039-8

I. ①帝… II. ①吴… III. ①干旱—历史—研究—中国—18世纪
IV. ①P426.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4347号

帝国之雩——18世纪中国的干旱与祈雨

著 者：吴十洲

责任编辑：陈连营

装帧设计：王孔刚

出版发行：紫禁城出版社

地址：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100009

电话：010-85007816 010-85007817 传真：010-65129479

邮箱：ggzjc@vip.sohu.com

印 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960毫米 1/16

印 张：25

字 数：300千字

图 版：41张

版 次：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

书 号：ISBN 978-7-5134-0039-8

定 价：46.00元

帝国之雪——

18 世纪中国的干旱与祈雨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帝国之雩

吴十洲 著

18世纪中国的干旱与祈雨

序

欣悉吴十洲先生大著《帝国之雩——18世纪中国的干旱与祈雨》行将问世，遵十洲先生嘱，谨赘数语，以附骥尾。

吴十洲先生早先负笈南开，师从朱凤瀚先生问先秦史，由梳理典章制度入手而得治史门径。爬梳文献，会通经史，遂成《两周礼器制度研究》力作。其后，开阔视野，驰骋古今，多历年所学而再成《乾隆一日》大著。为乾隆一朝史事所独具研究价值的吸引，最近数年，十洲先生深入其间，左右采撷，精力尽在清代三百年历史中。好学深思，用力专一，终成此新著《帝国之雩——18世纪中国的干旱与祈雨》。

有清一代，高宗当政的六十年，凭籍其父祖奠定的雄厚国基，经济平稳发展，社会相对安定，一度将文明古国推向鼎盛。然而曾几何时，国库空虚，民怨沸腾，贪风炽烈，政以贿成，太平盛景倏尔之间已成万马齐喑。同经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比，此时的清王朝已经落伍太多，相去越来越远。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遭人侮辱、宰割，这样的历史教训是何等的沉痛啊！

十洲先生的新著，试图从一个侧面本质地还原历史，探讨酿成历史的深刻根源，进而总结其间所蕴含的历史教训。一叶知秋，由小见大，此一

小题大做的为学方法，祖武最是佩服。因之而东施效颦，敢唱同调，敬请十洲先生并诸位大雅指教。

陈祖武 谨识

2008年1月4日

目 录

序（陈祖武）	5
前言	10
1干旱的梦魇	27
2水何以属黑	40
3皇帝也呻吟求佑	49
4雩帝神祇	60
5天人合一	71
6满族人的关帝崇拜与“关帝磨刀雨”	79
7七年常雩设坛案	89
8礼部的回复	93
9求言	102
10皇帝的“小疖”	107
11赈灾与仁政	113
12救灾与吏政	126
13大祀与中祀并行	141

14黑龙潭与龙王爷	150
15二十四年的大雩祭	163
16以阴克阳	171
17钦天监里的西方传教士	185
18《皇朝礼器图》	197
19《增补坤輿全图》与《泰西水法》	205
20三十八年与四十七年常雩官场风波	218
21葫芦僧判葫芦案	225
22旱灾与刑名	233
23大陆季风性气候与乾隆帝对旱情的忧惕	239
24巫术与常雩大典	246
25《大云轮请雨经》	258
26社仓与老母猪过河	272
27旱地摊戏《斩旱魃》与《雨经》	278
28黑风黑雨的预言	293
29干旱的西部与回民暴动	302

30水源与西部战事	319
31粮市与粮价	330
32灾民、流民与以工代赈	339
33南方亦有旱情	352
34农田灌溉与人口	361
35干旱与摇而不动的农本主义	368
36番薯、除蝗与坎儿井	379
 附录：乾隆朝雪祭礼典一览表	 388
后记	395

前言

谁说过，历史的事实，乃是心理学上的事实。这话好像只是说了一半。大凡历史进程中，所谓事实，不会不以丰厚的社会的与人文的精神元素作为根据。历史之所以生动，正是由于人们的心理因素造就了无数的具体的、偶然的事件，而这些“心理学上的事实”在历史的洪流中，最终还要按照某种指导思想出现。我们祖先的文化成就除了具有东方式的物质形态之外，同时复有独特的精神与丰富的思想。只是如此的精神现象在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中并非是以整体形式呈现的，而是经常性地被演绎得支离破碎，这样，历史便以“心理学上的事实”呈现出来。

宗教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精神领域的人文现象，宗教的历史自始至终充斥着一种混杂不清的理念。尽管如此，在西方学者的描述中，中国人仍被认为是“对宗教漠不关心，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物质事务中，沉湎于生活乐感的一群人”¹。

1 参阅卫三畏：《中国总论》（纽约，1848年）第2卷，第367页。引自[美]M·G·道森（Mary Gertrude Mason）著，杨德山译：《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中华书局，2006年，第267页。

如此而言，那么，这本书中所展开的并非纪事本末体的乾隆年间的故事，也就可称作是一个心理学上事实的综合体。一个个亢旱的年份与反反复复地向神明祈求雨泽的场景，就像是一大堆非理性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片段和许许多多亦真亦幻的影像，而这次写作就是要收集那些散落在那一时期的相关行为与态度的历史碎片，汇聚整理，以供当今社会思考。

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宗教只有在退出国家权力结构的时候，才会更清晰地显现出其在历史中的意义。对于清朝的祭神体系，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去认识。其一，纳入国家祭典的宗教，构成了清王朝国家公务的范围，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政治与宗教高度结合在一起；其二，清朝皇帝经常以天下生灵代表的身份进行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使皇帝成为了百姓对上天的代言人，成为了祭典上的主祭人，其中几位皇帝通过对宗教思想的阐释而成为了实际的宗教领袖；其三，国家级的宗教祭典，使满清皇帝在文化意识和价值观上与以往的正统文化传统保持了一致。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在这本书中出现的主角——乾隆帝，是一位拥有着满族血统的皇帝，而从他所主持的国家祭典的宗教角度来看，他所奉行的宗教精神与中原以往的正统文化没有丝毫的不同。

宗教之所以实现着人类的文化价值，根本在于，宗教是一种人类出于本性，企求超越世俗的现实社会，以追求精神价值之提升的精神超越。康德将“我可以希望什么？”作为哲学研究领域中设定的“宗教”问题¹，这是由于宗教意识的本质就是“自然生命解脱而皈依于神之意识”。诸如：如何知道有神？神的信仰如何发生？神如何满足人的欲望或人生价值的要求？等等问题，都是继宗教意识之核心而引发的意识。对于宗教本质给予客观的理解，正面肯定宗教的价值，用同情的心怀去体会宗教的精神胜境，并在当代宗教思想家们所做的不同界定之间，给予乾隆朝的宗教精神与宗教意识以恰当的阐释，这些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宗教不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足以安置人生之心灵归宿的途径。但是，宗

¹ 参阅《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0页。

教所要安顿的不只是现实的人生，也不只是伦常之道的安排或现实文化生活的满足。然而，观察了乾隆年祈雨的祭祀过程就会发现，这一过程所表达的宗教诉求与前文所述宗教的本质精神似乎并不在一个层面上，这种不同反而更加激发了后人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探索意识。清季，包括康有为在内的一些人提倡“保教”，梁启超则在1902年明确提出，“国必恃人以保之，教则不然。教者也，保人而非保于人者也¹。”梁氏的论断说明了宗教所具有的真正价值。而当“迷信”最终成为中国旧有宗教的重要符号，宗教在中国即已丧失了其在旧有社会向新兴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必备的精神价值。

祭祀是所有宗教行为中最为典型的一种。乾隆年祭天祈雨的史实更多地表现为宗教形式与政治行为的结合。当宗教的偏见、幻觉、信念、信条和原则与政治行为相联结时，宗教的体验便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与社会条件下，在相对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构成了一个变幻多端、交错纵横的精神过程，并通过奉行宗教仪式承受了人们的情感，而这也正是统治者的某些宗教行为的真实动机。为什么这一政治体系的决策人会把充满着偏见与幻想的宗教强加在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情感之上，并让它成为全体民众的行为动机和出发点？答案就隐藏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那便是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充盈着一种共有的情感和幻想，统治者于是借用某一部分人的心理过程诉诸于具有相同情感的所有人，并使其变成普遍性的社会情感。18世纪的乾隆帝就曾试图把祈神求雨的情感与观念升华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万世而不惑的所有人的情感与观念。

我们知道，寻求历史因果规律的努力，是一种没有终极结论的认知过程。在这样一个具有社会人文科学意义的认识过程中，如果将类似于“常雩”的宗教实践仅仅视为迷信，那么也就不可能宽容曾经出现在如此宗教观念中的理性内核。如果这些宗教不可能被宽容，那么，围绕“干旱”而奉行的宗教也就不值得历史学与文化学去关注。拟或试图再现历史的真相，然而

¹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卷一（上），第164页。

我们却远离了“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¹的时代精神，因此历史最终成为了当代人的历史认识。狄尔泰说过：“再现是靠两个因素：对环境或外部情境每一生动的想象都在我们心中刺激起一个再现过程，而幻想则能够加强或削弱我们自己生活联系中所包含的力量、感情和愿望的重点，从而使我们可以对他人精神生活进行复制。”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宽容的胸怀去面对这样的已经逝去的宗教实践与精神，而是一味地将其视为糟粕，那么我们将不可能理解它所产生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

一个完整的宗教意识是包含了解脱意识、虚己意识、超越真我意识和与崇拜皈依意识³。当人们从自然生命之物质欲望中解脱而出，并在虚己意识中让超越的“真我”呈现，就进入了神所引导的世界。当年乾隆皇帝奉祭圜丘之神圣存在的“崇拜皈依意识”是不容置疑的。在神灵面前，乾隆帝俯首降心，追求与神圣存在相联结，可见祈雨祭典是包含着情感与意志的精神活动。在此崇拜皈依的情操与意志中，自然生命被神圣、超越的生命所贯注而神圣化，成就了“宗教的再生”，这是宗教精神的核心，也是宗教生活的中心。在祈雨过程中，这些，乾隆帝都虔诚地完成了。

然而，无论乾隆帝的宗教过程做得如何虔诚，“雩”祭的思维世界并未完成超越自然神崇拜的心理历程。人们面对自然灾害所产生的内心恐惧，乃是由于推断自然灾害背后隐含着超自然的力量所引发的，并不是自然物本身可以成为人崇拜的对象，这代表着人的宗教意识并未从自然物宰制的封闭中解放出来。而“旱魃”在心理学上的事实正是如此，它所引发的恐惧，在那个时代几乎是无法克服的。而今天，随着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了解与控制，自然神的崇拜意识已被消解而蜕变为工具意识，即使再大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灾害，也难以唤起人们对于自然物的恐惧或崇拜之情，这就使我们在理解乾隆年间的“雩”祀时，面临一种情感上的障碍。

1 《马王堆帛书易传》。

2 [德]威廉·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活表现的理解》，《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3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文集》第20卷，1958年，第479页。

中国人信奉的神与西方的神当然不一样。在西方人看来，神是一切圆满事物的观念上的造就者，而中国人的神至多是一切圆满愿望的精神托付者。西方人通常这样解释中国宗教中的奉神的目的与意义，“中国人不仅没有向神献上富有人性的祭品，而且对罪过也不做任何忏悔和弥补的表示。为讨得神灵的喜欢而奉献礼物，奉献的目的是自然的；中国人对赎罪的意义毫无认识。罪过是冒犯了人而不是神。神是中国人处罚别人的判官，犯罪者只要奉神和向神送礼物就能逃避神的惩罚。中国人因此贿赂他们的神。”¹毋庸讳言，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中，存在有某些消极的特征。

作为朝廷祈雨的奉祭——常雩，说到底是一种与古代农业生产方式相契合的政治文化现象。乾隆朝改“常雩”为大祀的史实说明，原本是骑射民族的满族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后，不仅全面接受了中原的农业生产方式，同时也接受并进而强化了中原农业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表现突出的正是那些被纳入国家祭统的，有着显著农业文化特征的精神领域的最高形式——宗教。如古训所说：“夫圣王之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²那些被纳入正统祀典的神灵必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就满族统治者而言，这也正是人们所说的满族政权自身的汉化过程。



旱灾是人们经常经历的最为不确定的典型灾害性天候之一。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这样的问题就越急迫——什么时候下雨？干旱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如何评价旱灾与水灾之异同及其对于社会的影响，这似乎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量化与界定旱灾的主要困难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与一目了然的水

1 [美]M·G·道森(Mary Gertrude Mason)著，杨德山译：《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中华书局，2006年，第267—268页。

2 《国语·鲁语上》。

灾截然不同。”¹水灾持续的时间有一定的限度，这进一步凸现了水灾的时限性特征。洪水造成的灾难也许是非常可怕的，但当暴雨停止、洪水退去后，幸存者一般都能返回村庄，修缮或重建房屋，恢复日常劳作，有时甚至能够得益于洪水退去时泥土淤积形成的肥沃的新土壤层。旱灾发生和发展的方式与水灾大不相同，对于人们生活的冲击也是水灾所无法相比的。一般来说，确定旱灾结束的时间并不困难，但旱灾何时开始，却不好确定。实际上，干旱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演化成旱灾。《公羊传》桓公五年上有句话说：“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意思是，“大雩”祭是什么呢？是因干旱而奉行的向天神祈雨的祭祀。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干旱呢？是由于奉行雩祭就一定是出现了旱情，而如果直接说发生了旱情，则不一定就会奉行雩祭。那么史书为什么会这样记载呢？这是因为干旱已经被确认成灾。由此也可以看出，干旱何时被确认成灾，会由于受到人们心理因素的影响而被延迟或提前。

在因旱灾引发的漫长的生存危机中，有产者会乘机扩张其土地占有量，从而加重了已有的不平等状况，这时经常能够起作用的机制是抵押借贷。在持续干旱引发饥荒的煎熬下，无奈的人们对当铺的需求骤然增加，这时，“当铺经营者就可以压低质当物的价格，并提高利息率——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机会。这种机会只有在严重并长期持续的灾害导致人口结构性的、且不可逆的穷困潦倒和财力耗竭时才会受到威胁”²。对于那些有能力囤积粮食的人来说，长时间的旱灾是大发其财的机会，任何有粮食和货币可供出借的人都可以利用价格上涨之机，投机贩卖，牟取额外利润。旱灾引发的饥荒给富人和穷人带来的结果相反，收入的差别越发扩大，一部分人通过借贷获取高额收入，而另一部分人则债台高筑。每逢遇到这样的生存危机，就会有人“指田为当”，这就势必造成越来越多被典押的土地因无力被赎回而被卖断，这种既便利又能廉价获取土地的形式，进一步加剧了土地所有权的过分集中，而这种不平等正是社会所有对立、冲突的根源所在。乾隆年的旱

1 [德]威廉·丹多：《饥荒地理学》，伦敦1980年，第11页。

2 [法]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页。